

1998年中国现代史研究部分观点述要

姚玉萍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1998年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近4000篇。这些论文涉及中国现代史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现将这些论文中的部分观点分四类综述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一)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提倡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史学界突破传统定论和学术禁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力度不够,李坚认为还有若干误区^①:第一,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毛泽东主要是从现实和需要的需要出发去论史,所以难免失真。如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实则在此之前梁启超等人对马恩著作已作过介绍。第二,关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仍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毛泽东等信仰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提出“五四”时期出现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此说显然有误。严格地说,一批初步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应在“五四”运动之后。第三,关于各阶级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过分抬高了工人的觉悟和作用,贬低了商界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觉悟,不符实。运动的结局应该是各种力量的综合,工人的觉悟程度和参加斗争时间,要低于和晚于学生、商界和民族资产阶级。第四,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与思想基础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是初步共产主义者,否认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思想基础是布尔什维主义。从整体上看,运动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领导。从主导上讲,各地、各阶层的领导力量属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才是其思想基础。

欧阳哲生在《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②一文中,首先引用了“话语”一词(非纯语言学概念,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指出“五四”运动是由两大思潮(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催化而成。激进主义不排斥民主,但对革命的热情又不择手段,最终将自己推向反民主的道路。自由主义也不反对革命,但对纯正民主生活方式的追求,使其不得不抛弃日渐暴力化的革命,走上了渐进之路。激进主义后来在政治上得势后,革命话语系统就成为主流,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有二:其一,“五四”传统丰富内涵被某种单一话语所阐释,其中某些成份,诸如革命、爱国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影响等,被不成比例地扩大;另外一

些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思想,如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则被淡化、忽视。由此阐释和助长的“五四”传统,实际上不过是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其二,许多学者由于接受了革命话语系统思想的影响和训练,习惯于从反帝反封建或启蒙救亡的视角透视“五四”运动,因此研究思路不张。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基本立场就是自由主义,对于革命话语系统强化“五四”的革命性色彩,他深为戒惧。他理解“五四”,认同“五四”,但他深知如不从理性的角度加以适当的解释,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真实内涵予以深刻挖掘,“五四”运动的内在局限就会放大,它本应有的历史意义终将丧失。胡适自由主义话语的特点主要有:幽暗意识(对各种黑暗势力的正视与省悟)、自由意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开放的意识。他一方面希望继承“五四”运动的自由、解放精神,一方面又忧虑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泛滥,形成一种“不容忍”的革命浪潮;他肯定“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赞扬学生的爱国激情,但又害怕学生的爱国热情膨胀,成为新的排外主义运动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资源;从他最初对学生运动提出理性化的要求,到他强调“五四”的自由主义性质,再到他晚年反省“五四”,称它是“一项不幸的政治干扰”,可以看出胡适始终将“五四”运动作低调处理,与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高调形成了对比。

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彻底性的问题,华东师大的周一平有以下观点^③:“五四”精英如胡适、陈独秀等,当时对帝国主义尚无理性认识,故不可能彻底反帝;“五四”运动只反对日帝,且仅限于抵制日货;“彻底反帝”的调子是后来拔高的。这对传统陈说是不小的突破。“五四”新文化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里程碑。段培君对新文化价值结构及特点作了论说^④,认为新文化价值结构有四个层面构成:文化内容(民主与科学,且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文化载体和形式(白话文和新的文学式样);文化理论(中西文化结构层次的比较);文化机构和组织(《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等传播媒介与教育机构)。四个特点是:(一)构成方面,西方的文化内容与中国民间文化形式的某种整合;(二)功能方面,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三)高度的相干性是五四新文化结构作为思想文化子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在相互关系方面的显著特点;(四)理论方面,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从进化观到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实际上,新文化结构的特点由发展观到唯物主义观,当是后事。

朱志敏在《“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民主观新探》^⑤中

提出:(一)“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中,从事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主张各有侧重;(二)一战后,进步知识分子民主思想发生变化,对民主含义进行了再认识;(三)进步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大多抛弃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义”,认为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民主”。

(二) 关于蒋介石与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

如何从不同的侧面实事求是地看待南京政府的方针政策问题,是1927年到1937年研究中的一个焦点。

周颂伦在收集大量珍贵史料的基础上指出^①:决定蒋介石在第二次北伐中态度的,不是青山会谈,而是在此之前的箱根密约,它才是蒋1927年访日的真正结果。密约的内容是:“(一)日本承认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断绝后国民革命的成功、支那的统一。(二)支那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以此为要点,双方圆满地达成了谅解。”

东北易帜到“九一八”这段时期,张学良集团与南京政府关系十分微妙。郭正秋认为^②:蒋介石企图用“外交解决”手段控制东北,而张学良则极力把“外交麻烦”推给蒋介石。最终,张学良经历依赖和失望后,走向自主。此期的蒋、张关系,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集团利益冲突的反映。

30年代,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杨天石在收罗鲜为大陆学者所知史料的基础上^③,详尽论述了国民党内反蒋抗日的四股潮流,文中的史料尤为珍贵。

西安事变是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关键。刘灿华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和派的和平救蒋活动》^④中,对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为代表的主和派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相对传统观点中过分强调中共作用是一个突破。实际上有人已指出:周恩来来到西安后,中共才最终决定不杀蒋。

对于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传统观点多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徐锋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政策》^⑤一文中,对南京政府在维护国家的完整、独立以及民族尊严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余子道在《敌乎?友乎?三十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论争》^⑥指出:蒋介石一派力图化敌为友、避战趋和;汪精卫一派始终认敌为友,主张满足日方要求;各派人士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力主抗战。作者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引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先生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前主任委员李云汉先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孰是孰非,让读者定论。

30年代的对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较为重要的一环,但相关研究较少。刘殿君^⑦对德国对华军援作了充分肯定。

经济建设的好坏,对国家发展起决定作用。周绍英对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快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财政金融、交通运输与国际建设联系起来的作法作了评述^⑧,肯定了它对抗战的积极作用。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税制改革问题,陈勤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⑨文中,认为:收回了一些主权,抑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盘剥,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作者还指出:南京政府的税制改革是在极艰巨的条件下进行的(外有列强的干涉与牵制,内有地方实力派的顽固阻挠),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张生对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后,奠定国民政府关税的基本框架;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后,实行关税改革和打击走私,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⑩。

(三) 抗日战争与中外关系的研究

熊沛彪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⑪中,综观了日本的“协和外交”和“武力外交”两种策略,围绕其在东亚战略中交替推行的发展过程,指出以“经济提携”为核心的“协和外交”,实质是要先从经济上使中国逐步沦为日本的附庸,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实现对华“全面提携”,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确立日本“指导下”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武力外交”则与前者齐头并进,企图以局部扩张为基础,实现对华全盘目标。二者目标一致,方式不同。其战略意图一方面旨在建立一个在对苏美英战争中取胜的总体战体制,另一方面则要设法使中国由亲英美转向亲日,奠定其东亚霸主地位。针对日本在不同阶段的对华政策,南京政府的对策经历了由缓和谈判到针锋相对的变化过程,从有利抗日和争取美国支持的角度,不断调整对日对策,提示了日本对华战略策略破灭的必然性。

对于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马若义在《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⑫一文中,阐述了两党关系从迅速出现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向缓和、对抗、谋求对话的转变,直至迅速结束对抗、合作抗日的发展历程,又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考察了迅速“解冻”的原因,指出首先在于国内全国人民尤其是侨胞和中间党派的有力推动;其次,国际因素的有力制约,反法西斯的国际形势使国共团结、共同抗日尤为重要;加之日本利用此时机大肆进攻河南,激化了民族矛盾。迅速结束对抗是两党调整策略,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蒋介石于事发后发表的“1·27”讲话,是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关键和转折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一般被称为“东方慕尼黑”。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⑬一文认为,“远东慕尼黑”不能用在英美在东方的对日妥协倾向上。因为“慕尼黑”妥协至少应具备几个特征:1、妥协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问题;2、妥协者所出卖的是他国的重大利益;企图牺牲他人,保全自己;3、妥协的目标是绥靖侵略者,而不是为了日后不可避免的一战。通过逐个检讨英美的重大妥协行为,发现无论是英国的有田—克莱琪协议和关于滇缅路禁运达成的协议,还是《日美谅解案》,都是受制于情势的权宜之举,都是旨在阻缓日本侵犯其利益的局部性妥协。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是援华制日,这些妥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的是妥协者的权益。

《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突出例子,所附“宣言书”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李嘉谷在《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⑭中,认为条约所附“宣言”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重大打击,并导致日本更肆

意地侵略中国。同时,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苏对华援助政策改变,所以对当时中国抗战的不利影响不宜估计过重。就二战全局看,条约的缔结还有其积极意义。对于稳定远东,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集中力量战胜法西斯德国,促成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

曾长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若干史实新证》^⑧中,指出党创建于1920年,1921年“一大”召开前,名称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就有党纲、宣言、党刊。有中央、支部和外围组织;有总书记及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从组织、章程上具备一个党派的成立条件。中共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后,又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成立支部,接受上海的领导,所以,各地的早期组织一律称支部。史料表明,济南和长沙在“一大”前并未建立支部。另外,包惠僧参加“一大”,只是偶遇,不是作为代表出席。“一大”开幕地点,党史都称是在李汉俊家,但依据近年来考证,“一大”前五次会议的会址应是上海博文女校,国际代表还在博文女校举行的开幕式上作了报告。“一大”于8月5日闭幕,而非普遍认为的7月31日。中央局和书记处是同时产生的两个机构,而非合而为一。

在《对大革命时期革命领导权问题的再认识》^⑨一文中,赵军祥区别了阶级领导和政党领导两个概念,认为阶级领导指的是政治上的领导,而政党领导则是组织上的领导,是对具体革命行动的指导。前者是后者的向导和指南;后者则是贯彻前者的具体步骤和保证,二者一般是一致的。但大革命时期,阶级领导归于共产党,政党领导则归于国民党,二者通过两党合作得到了间接统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也基本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很好地得以体现。所以以国民党的革命性为基础,实现了阶级领导和政党领导的间接统一,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形式。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是这种间接统一的分裂。

史学界关于土改运动的重大作用,多限于其对革命战争胜利的影响方面。郑志廷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历史作用新探》^⑩中,从其对中国农村由传统农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中的作用作了分析,指出就此而言,土改是共产党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它从根本上废除了中国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可以将生产所得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一变革使解放区农村走向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新社会,同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原料,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创造了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所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实现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经阶段。

西柏坡精神研究在近年来兴起,学界对其认识不一。谢忠厚在《关于西柏坡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⑪一文中,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领导历史性转折的伟大实践中铸就的代表历史转折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作者较系统、全面地

阐述了精神的本质、基本内容及其相关的历史主题、重要课题,并阐述了研究西柏坡精神的基本思路,认为研究应包括四个关联的方面:精神的产生和形成、其本质与内涵、精神渊源、精神的弘扬和发展。而宋志宏和李丽芬在《论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内涵》^⑫中,着重阐发了其历史内涵,即我们党在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这种精神是当时革命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注 释:

- ① 《试评五四运动研究中的若干误区》,《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 ② 《中国文化研究》(北京)1997年第4期。
- ③ 《对五四反帝运动彻底性的再认识》,《探索与争鸣》(沪)1997年第12期。
- ④ 《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第6期和《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⑤ 《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⑥ 《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⑦ 《试析1928—1931年蒋张在东北地区对外关系上的分合》见《松辽学刊》社科版1997年第4期。
- ⑧ 《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⑨ 《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
- ⑩ 《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 ⑪ 《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
- ⑫ 《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
- ⑬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举措述评》,《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⑭ 《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 ⑮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关税政策与实践述评》,《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 ⑯ 《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⑰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 ⑱ 《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 ⑲ 《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 ⑳ 《武陵学刊》社科版(常德)1997年第5期。
- ㉑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 ㉒ 《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 ㉓ 《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
- ㉔ 《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

作 者:姚玉萍,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馆员。

(责任编辑 张 琳)